

日治時期的神宮曆與臺灣民曆

文·圖片提供／蔡錦堂（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）



▲圖一：戰後的神宮大麻（右）與神宮曆。

1895年，唐景崧、丘逢甲等成立「臺灣民主國」時，在向全臺紳民發布的文告中，有所謂「恭奉正朔，遙作屏藩」一句，意思是說臺灣民主國雖自立為國，但仍會恭奉大清帝國的「正朔」，當作清國的藩屬。這裡的「正朔」一詞，指的就是「曆書」，向來作為君臣或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關係的象徵之一。

曆書作為「正朔」的象徵之外，也是主導民眾日常生活的重要「出版品」。如果說《聖經》是全世界印刷量最大的出版物，那麼說曆書是東亞世界中每年最暢銷的印刷品也不為過。

日本向來深受中國文化的

影響，因此也學會了使用曆書，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餘，在臺灣所使用的曆書，除了從中國輸入的曆書之外，最重要的是「神宮曆」與「臺灣民曆」。底下即就這兩種曆書作概括性的陳述。

日本向來參考中國的曆書（太陰曆）加以改良使用。明治維新後，於1873年改採太陽曆，1883年開始，統一由奉祀

天皇家祖先神天照大神為祭神的伊勢神宮來負責印製及頒布。而其內容編纂作業，1890年開始委由東京大學東京天文臺負責。由於其為伊勢神宮來印製、頒布，因此俗稱「神宮曆」。每年年底，神宮曆即與「神宮大麻」（伊勢神宮的神符）一起向全國民眾發行，日治時期的臺灣也不例外（特別是1930年代中期以後）。（現今的神宮曆與神宮大麻可參照圖一）

神宮曆的內容主要含：星座、月日配置、七曜（星期）、干支、日日出入、潮汐、節氣、各地平均氣候、五穀播種季節、度量衡表、對照年號表等，予以

明細記載，也列出全國神社主要官國幣社所在、例祭日等；特別是加上新年、紀元節、天長節、明治節等四大節，以及春季皇靈祭、神武天皇祭、秋季皇靈祭、神嘗祭、新嘗祭等所謂的「祝祭日」。很明顯的，神宮曆除了給予民眾向來傳統農業社會有關節氣、日出日沒、潮汐、播種季節等訊息外，也藉著與國家祝日、皇室祭祀等祝祭日的記載，主導國民年中生活節奏，將以天皇、國家為中心的觀念，滲透進入民眾意識中。

但是這樣的神宮曆終究與臺灣的民情有距離，日治初期臺灣人家家庭仍然習慣使用從中國輸入的「中國曆」。1914年（大正3年）起，臺灣總督府為了解決臺灣人仍使用中國曆（正朔）的問題，開始編纂發行「臺灣民曆」。（圖二）



▲圖二：大正3年的臺灣民曆。



▲圖三：昭和2年臺灣民曆封面與封底。

臺灣民曆最初由臺灣總督府地方部編纂發行，1921年起發行事業委託事務所設於總督府內的「臺灣神苑會」辦理。筆者目前所藏全套「臺灣民曆」，始自1914年（大正3年）至1944年（昭和19年），共31本（其中大正16年的臺灣民曆，因大正天皇於15年底去世，故已印製發行的曆書只得由使用者自行改為昭和2年；見圖三）。

臺灣民曆的內容，大致上參考神宮曆的樣式，如果以1944年（昭和19年）的臺灣民曆（圖四）來看，封面裡與封底裡即刊載自第一代神武天皇以迄

124代昭和天皇的「皇國年表」（圖五）。內頁首頁亦仿神宮曆，將國家的祝祭日置於首位，唯祝祭日方面，臺灣民曆增加了「始政紀念日」（6月17日）

與「臺灣神社祭」（10月28日）；不用說，日本統治臺灣原點的「始政紀念日」，以及臺灣統治象徵的總鎮守臺灣神社例祭日，對於日本統治臺灣是有重要烙印功能。曆書上的這些日子上面，均清楚印著日本國旗「日之丸」，是為「旗日」，在掌控民眾生活節奏中，具有重要的機能與意義。

在進入戰爭期的1937年（昭和12年）以前的臺灣民曆，與神宮曆還是有些不同的地方。例如在首頁「凡例」上，臺灣民曆即以「漢文」記載，並附有陰曆，也清楚註明二十四節氣，並將中國曆中擇日的「宜

忌」部分，僅選擇「宜」（吉）的部分登載，而捨棄「忌」（凶）的內容。總督府方面對這樣與神宮曆不同的內容編輯方式，做了「顧及民情」、「採擇無害的舊慣俗說」、「過渡時期」的解釋。如果以1914年至1922年臺灣民曆每年發行部數約6~8萬本（占臺灣人戶口數約10-13%左右），使用率委實不高。

如以總督府於1940年曾做的「島民多數仍常用對岸輸入的支那（中國）曆或民間雜曆」之說明來看，臺灣民曆似乎並未能攫取臺灣民心。其未能成功的原因，或許與臺灣人，特別是農家的年中生活節奏，實與傳統的中國節日：春節、元宵、清明、端午、中秋、重陽節等等有關；也與庶民尊崇的媽祖、城隍等等神明的生誕祭日密切結合；而捨棄擇日中的「忌」部分，對於敬畏鬼神的臺灣庶民之結婚、開市、遷徙、安葬、破土等造成不便。這些或許是只從上而下，以統治強權塑造民眾生活規律的神宮曆、臺灣民曆，無法在臺灣生根的原因吧。



▲圖四：臺灣神苑會出版之最後一本臺灣民曆。

▲圖五：昭和19年臺灣民曆裡刊載的「皇國年表」。